

## 制定面向未来的青年战略

□ 田丰 顾旭光

### 以住房问题为代表,我国青年面临的生存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新录取大学生数量快速增加,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85万人,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扩大了6.3倍;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4%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75%,提高了2.2倍。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相对而言青年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下降趋势。

作为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当代青年人,他们成长和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变迁、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年代,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文化素质更高,国际化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开放,更加强调自我,更渴望成功,同时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对社会不公平具有强烈感知,并做出激烈反应。这些特点既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有关,又与青年所处的人生阶段相联系,正因为如此,在时代变革和人生转折的关键时期,青年的就业和发展影响到国家和社会发展。我们必须重视青年在就业和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是中国社会随着劳动力市场日渐成熟,旧有的社会制度控制力减弱,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消费、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容易积累群体、阶层之间的对立。

二是教育结构性问题突出,与就业需求存在矛盾。中国教育改革和就业市场化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需要信息不对称,教育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方向偏离社会需求,专业设置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就业机会仍然集中在低端劳动岗位,导致青年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一些福利待遇较好的垄断企业,人才高消费现象突出,不仅造成人才资源浪费,也挫伤了其他青年就业的积极性。而中小企业劳动力岗位供给由于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的差距,难以提供给青年良好企业培训、职业规划 and 晋升机会,无法吸引青年就业。加之一些青年自我定位不清,高不成低不就,更加突出了就业供求之间的矛盾。

三是青年生存压力相对加大,部分负面情绪在网络与社会中蔓延。青年承受一定压力,压力来源首先是对住房和其他耐

用消费品的购买存在障碍和困难。青年住房问题俨然成为一个社会话题,青年通过调侃、讽刺等各种方式讨论住房问题也从侧面显示住房正在成为青年的主要压力源。与80后青年不同,对于90后青年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市场红利已然消失,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相对成熟并且还有上升空间的市场,高昂的房价和普通大学生低收入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相应地在网络上,一种调侃式自嘲的亚文化正在兴起,这种情绪也有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

四是制度壁垒仍然存在,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农民工群体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演化之后,出现多样性、个性化变化,不再是同质化的群体,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真正务农经历,在他们身上除了农村户籍外,很难找到农民的痕迹,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经历多年务工经商生涯后,落叶归根重回农村务农。相反,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更为强烈,追求与“城里人”同等待遇的要求更为迫切。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但是,在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壁垒区隔下,现行社会政策虽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所改进,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融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阶层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

### 中高速增长可以使我国的青年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准,但我们同样需要未雨绸缪,制定长期性的国家级青年战略

当前我国整体还处于改革与变动的快速发展阶段,青年在就业、发展等各方面都存在挑战。政府应以青年就业为基础带动青年全面发展,降低不平等,促进青年政治参与和社会融入。优质的就业能够弱化社会不平等,是促进青年政治参与和社会融入的基础因素;长远来看,更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打下人才储备基础。

首先,要完善和实施国家层面上的青年发展战略。

在世界青年状况堪忧的背景下,在青年战略的指导下以短期和长期政策着手,既是对现有问题的回应,也是未雨绸缪的理性决策。在综合性宏观性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具体微观政策的实施,使处于不同状态、不同位置的青年得到符合其需求的帮助,最终保障青年的就业和发展,保持社会中青年整体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一是采取协同性青年战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制定在全面的数据收集和青年实证研究基础上的青年战略,在战略的基础上再制定立足于现实的、实验性的创新政策,而后过渡到推广层面。二是政府要对不同主体进行刺激和引导,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激励性政策团结并联系所有利益相关者,整合地方政府、企业、教育系统、NGO组织等全面行动。三是政策要能够明确指向青年就业问题的不同主体和不同阶段,以构建有效的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为基础性目标。

其次,要实施推进青年就业的社会政策。

青年就业有三个主体:青年自身、雇主和劳动力市场。青年就业的状况由不同因素和主体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传导性。当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时必然会导致青年就业水平下降,而雇主的需求和青年自身的状况也会影响就业最终的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受到政府和其政策的影响。

一是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手段,促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在当前也可以通过鼓励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需求活跃,同时还能间接促进青年创业。二是对于雇主方面,应该积极与雇主合作,通过财政政策刺激雇主积极接纳青年劳动力,或者为青年劳动力的发展和培训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搭建雇主、青年、NGO组织,以及青年组织的对话交流平台,协同解决青年问题。三是对青年方面,要从就业优先到培训优先。青年从事低端劳动岗位虽能解决就业的一时之急,但并非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长久之计,而应该从提升青年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点——技能方面着眼。

青年就业还存在三个阶段:准备、进入和稳定。在青年就业的三个阶段,需要增强对角线型流动,避免来自不利背景和在劳动力市场中不占优势的青年水平流动。对角线型流动指青年在学习和岗位流动过程中同时能够提升自己的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在社会位置和层次上呈对角线式的变动轨迹,而非陷入“劣势背景—低教育水平—低质量就业—得不到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机会—低质量就业”的恶性循环。

最后,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促进青年长远发展。

青年战略首先要注重就业数量到注重就业质量,注重青年长期发展,由稳定型发展到促进长远型发展。不仅将青年就业视为稳定社会的一项安全网机制,更要将其视为促进长远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帮助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和边缘的青年,保障青年就业。其次通过巩固教育平台方面增加青年发展机会,培养青年创新能力,提供良好就业服务,培育良好劳动力市场环境,拓宽青年发展空间,提供高效的就业渠道,增强青年创新发展可能性。在保障就业的基础上为青年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论如何,中国的优势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高速增长水平使青年失业率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相对较低水准。从社会情绪上看,青年总体上对自身的社会发展前景抱有积极期望,对前景也充满乐观期待。虽然存在一定缺陷,比如青年出现阶层分化、城乡分隔带来的融入问题、缺乏长期性的国家级青年战略、青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待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国家和社会上前景乐观,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新的可能性。通过国家战略和政策大力支持,使青年能够获得有尊严、体面的工作和生活,能够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思想界的“三岔口”

□ 王学斌

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陈独秀、李大钊们才真正明白了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

近代以降,特别进入民国,“西方”俨然化成一个国人心头爱恨交织的强势词汇,驱之不能,学之且难。然1918年却成中国人重新审视西方尤其欧洲文明的拐点。是年年底,梁启超赴欧参加巴黎和会。沿途梁氏穿过欧洲诸国,与随行者一道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部战场,莱茵河右岸,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足迹遍及比、荷、瑞、意、德等国,可谓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返国后,梁迅即提笔写下《欧游心影录》这一篇反省欧战的长文。

于此文中,梁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认定“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既然欧洲文明已遭破产,如何涅槃重生,药方何在?梁指出,其实“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良剂却在“灯火阑珊处”,即中国的“孔老墨三位大圣”。于是他文末呼吁:“我们人居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们!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梁氏此番言论,折射出其积极反思现代性之文化自觉。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8世纪以降的欧洲,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工业化浪潮汹涌,理性主义凯歌猛进。也是之故,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性,迷信科学与理性万能,渐成了“普遍的社会思潮”。但欧战的惨绝人寰,却又令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正基于这种亲身感,梁主张须重新审视自晚清以来不断推崇的所谓“西方”。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正在国内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评判的态度”也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亦即“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其三,切勿一味追随西方向,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主”。梁对时局变换、潮流更迭之敏感确异于常人,故梁深深感叹“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其“特异处,在感应敏捷,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

然此际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须反思现代性。比如系统接受英美教育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便执着于对现代性的追求,认为欧战并非引来世界思潮的巨大变更。甚至胡、丁诸位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其实不过是“谣言”而已。“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叹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然而“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拙摸捣动的。”反观梁氏提倡的东方文明,“其实呢,这是活死人的文明,这是懒鬼的文明”,“这种文明其实只是一种下贱的唯物的文明”。可知虽同倡扬新文化,但梁、胡等人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已呈大相异趣、针锋相对之态势。

与此同时,彼时思想界在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一种新的重要动向正潜滋暗长,呼之欲出。这便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起初亦深刻反思现代性,倡导文化调和与融汇。不过随着认识的深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终皈依马克思主义。

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我们不妨喻之为“倒放电影”。“倒放电影”手法之优点,在于结局早已知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彼时事件亲历者未能措意之关键处。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重要的发展,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但此手法亦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观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诛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见来凑”的现象。况且“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研究者常为避免枝蔓,勇于剔除那些与主题看似关系不大的史料,结果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但是否也有可能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毕竟如此裁剪势必遮蔽掉了历史本该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偶然性。

或许有时候,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明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越看上去有些粗枝大叶甚至不修边幅,其实越能折射出“整体”的时代意谓。作为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先期经历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洗礼,这绝非偶然。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他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事实表明,后者正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这是历史演进的自身逻辑,亦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楛



## 建新型智库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 崔树义

智库有事做,而且要使其做得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真正使其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同时,党委政府必须要有开阔的胸怀,不仅允许智库“求真”,更要允许智库“证伪”,保证智库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人云亦云,进而从根本上保证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

其次是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要成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脱离偏重纯理论研究的窠臼,根据现代智库的定位和目标,把研究重点转到应用对策研究上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就是重点围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省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把目光瞄准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党委政府的需求为导向,为其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长期以来偏重基础研究的格局,把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向应用研究大力倾斜,突出应用对策研究的特色,调动科研人员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应用对策研究的开展。就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并不是不要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因为任何有价值的对策研究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修养基础之上的,应用对策研究的创新,其前提必定是理论的创新。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是一个理论储备问题,每个专业人员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应用研究是一个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算是一个合格、称职的智库研究人员。没有理论储备,应用

研究就很难有深度、上层性;而没有应用研究,理论创新也缺乏源泉和动力。

再次是科研队伍与管理队伍的关系。要成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拥有一支既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现实调查分析能力的智库型人才队伍。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优化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结构。尽量在能够自主决定的范围内,将有专业技术职称、有较强研究能力的行政人员充实到科研队伍中来,同时将那些不适合研究的科研人员调离现有岗位。全面推行聘用制,实行岗位管理,建立规范的岗位竞争和任期考核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通过各种方式,培养造就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政治水平高、业务素质好、开拓创新意识强的青年科研骨干。三是要努力引进高端人才,同时充分发挥现有高端人才的作用。应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实行科研经费向重大课题倾斜、向优秀科研成果倾斜、向高端科研人才倾斜的政策,充分体现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价值,尊重学术自由,从多方面营造高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四是要提高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努力克服管理松散、利用多种形式提高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

最后是科学研究与宣传推广的关系。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因

此,要成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要巩固和拓宽传统的合作与交流渠道,加大成果宣传推广力度,尤其是打通应用对策研究的通道,建立完善定期向领导和领导机关呈报成果制度,让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能够迅速、直接进入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视野。二是应重视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要影响决策,首先要影响媒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智库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学会并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体加大成果宣传推广力度。三是要消除清高心理,主动接触媒体、智库及其研究人员应放弃对媒体的戒备或排斥心理,放下架子或者所谓的“清高”,主动接近媒体,努力与之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一味埋头“做学问”,坐等媒体上门采访。较大的智库,应设立专门的媒体关系机构,把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关对象。四是要与时俱进,学习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应转变观念,不再把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传播技术只当作是年轻的“时尚达人”的宠物,而要将其视为宣传推广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重要工具;要通过培训班等形式,组织研究人员、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学习使用这些技术;应把握不同媒体、不同受众的特点,在文体、文风等方面进行改进,增强作品的可读性、通俗性、可操作性和传播效果,使研究成果更易为公众所理解、接受。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所长)



新论语

### 金融危机使世界范围内青年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同时社会不平等加剧也阻碍了青年发展

由金融危机衍生而来的一系列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深刻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但城乡差异和改革带来的环境性因素等,同样使青年在就业、生活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是脆弱性群体,当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总需求变化时,青年的就业率变动比中年人更为剧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青年失业率往往是其其他人的两倍。因为青年自身的特点,用人单位替换青年的成本更低,所以存在其失业率相较于中年人偏高的现象。并且由于其缺乏工作经验,或者工作技能不足等特点,找工作过程中市场失灵现象更容易出现在青年身上。

当前世界范围内青年失业问题十分严峻。2000年至2011年期间,全球的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从52.9%下降到48.5%,这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15至24岁青年人口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全球2013年失业青年数量达到7300万,青年的失业率上升至12.6%,处于峰值。其中芬兰、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斯洛伐克和希、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家在2010年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超过50%的国家则包括希腊、西班牙和南非。在经济危机期间青年失业率上升越多的国家,发生青年运动的可能性越高。青年失业率第一的希腊,就发生了从2006年持续至2013年的示威抗议和骚乱事件。青年长期的失业会形成一种所谓的“伤疤效应”,即导致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下降,希腊和西班牙发生的抗议政府紧缩政策的运动被认为是“伤疤效应在政治和社会信任方面的表现”。

造成青年问题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社会整体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平等使青年人发展前景报以悲观态度,生存压力与日俱增。

联合国2013年的不平等问题研究报告显示,青年的长期失业会严重影响平等。失业青年可能难以顺利返回劳动力市场,甚至会导致终身失业。同时,在经济危机期间,青年的失业率上升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基尼系数上升。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约60%,最贫穷的50%人口占有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